

# 守住人性的底线

□木 弓

作家静心的长篇小说《大沙河畔》以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河南周口一条普通的街道和街上普通一家四兄弟的故事,描写了这些普通人在一个剧烈变化时代中所体现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描写了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作家并不刻意追求故事的传奇性,而是从普普通通的世俗日常生活入手,在家长里短的情节里透露出时代的信息,呈现出各种价值观道德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的影响,使得人们感受到传统道德的危机从而深刻认识到我们现实生活的本质。

从普通人的生活看到一个大时代,是这部小说的特色,而积极塑造人物形象则是这部小说突现主题内涵的根本途径。小说的中心是人物,只有把人物塑造好,作品的思想艺术才得以体现。

小说故事人物众多,关系非常复杂。家明、家清、家雨、家复以及他们的妻子们都活跃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作家并没有被众多人物关系搞乱,而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叙述,推动故事情节,写活了小说中的人物。

作者将重点放在老二李家清和他的妻子范淑芝的形象打造上。这两个人物,在故事中起着推动情节的作用。这两个人物都写得很精彩,有血有肉,有独特的个性,也突现了作品的主题内涵。

李家清是老李家的儿子们当中最没有出息的,命运把他推到生活的底层,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生存而奔波。他从小不爱读书,成绩很差,经常与人打架,还违反校规和女同学谈恋爱,是个问题青年。长大后没有多大本事,只能和父亲一起靠管理捞沙船过日子。这个人没有多少生意头脑,爱面子,很仗义,善解人意,最后竞争不过其他捞沙船只能破产。之后他想做其他生意,但钱却被人打劫了,只好又回到生活底层给人打工。妻子的哥哥卖假酒出了人命,进了监狱,是李家清挺身而出,变卖家产,还到处借债,千方百计托人,试图打通各个关节。结果,妻子的哥哥还是被判了死刑。李家清从此进入苦难的深渊中,那些巨额债务都得他去还。一个打工者要还这么多钱,根本没办法。他深爱着妻子,但生活的压力让他变得脾气暴躁,经常在家里打骂妻子,整个

家庭关系变得非常畸形。最后因银行要债,他无力偿还,还引发了整个家族的道德危机。

作家试图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底层人身上看到一点人性的光辉,看到他性格刚强的一面。他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对爱情的认可和对亲情的重视。他其实可以像大哥一样,有钱自己花,偷着乐,对家族的困难不管不顾,但他没有朝这条自私的道路上走,而是义无反顾把他做生意的本钱拿出来。作者写出他身上具有的传统道德品质,也写出他身上的矛盾冲突,写出他在金钱的重击下虽然举步维艰,但他的精神却并没有被金钱击垮。

与之相映的是他的妻子、丑媳妇范淑芝。她用不太善良的手段把李家清搞到手,又动了心思把家清拖入她娘家的灾难之中。她看似是一个丑恶的形象,其实,仔细读下来,我们发现,她其实是个心直口快,没有多深城府的人。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也知道自己给家清带来了不幸,所以,她特别忍让着家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辱负重,和丈夫共渡难关。她虽然嘴上放狠,但心地却非常善良,知道自己在婆家地位不高,便发挥自己做饭的特长,真心实意为这个家族服务,无怨无悔,这种品质其实也是非常淳朴可贵的。

其他几个兄弟形象也各有特色。发财致富的家明为了金钱放弃了亲情,放弃了道德。他和妻子成了六亲不认的另类。变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李家明的家庭出现了悲剧,他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婚来了结这段人生。作家在这里写出了金钱财富对人性的伤害,对人的道德和精神的扭曲。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也写得很出彩,那就是“玉儿”。她的气质中有很浓重的诗意,她一直以为大哥大嫂的爱情很浪漫,所以特别想刨根问底儿,希望成为她今后写小说的素材,但现实却让她看到了冷酷的一面,让她认识到真实生活和文学的距离。她对文学梦虽然出现了迷惘,但她也有收获。她认识到了家清和淑芝这对夫妇身上那种人性之光,道德之光,感受到了生活的暖意,从而更正确地认识了生活。她从淑芝那一点也不浪漫的生活中,感受到生活的某种力量,感受到生活的乐观精神。她为了保持思想的清醒和判断的客



观,有意避免卷入李家世俗生活之中,但随着她对李家人认识的深入,她发现,自己也是世俗生活中的一分子,也是世俗生活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小说中关于是否出钱救李家清的家庭会议是高潮部分,虽然家族中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动机不一样,但最终达成共识,表明这些矛盾冲突在这里达成和解。在这个部分中,李家雨和他的妻子阳新的个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不过,最重要的是玉儿的形象得到了升华。她从一个旁观者变为调整家族矛盾的参与者,她以自己本身就有的道德意识说服了家庭成员放弃个人打算,解救家清的困境。思想者变成了行动者,变成了家族团结在一起的推动者。

作家塑造这批小说人物形象,实际上是向我们传递这样的思考:不管世道怎样变化,不论我们面对怎样的矛盾和困境,守住道德底线,就守住了人性底线,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就能克服。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都在体现一种精神,那就是对传统道德的赞美和讴歌。

静心是女性文学中值得关注的一位作家。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根本。女性意识在不同的作家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我大致上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作家是重感性的,她们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并不是刻意的,只是天然的性别意识和性别心理的流露。一类作家是重理性的,她们的性别意识是有理论支撑的,是自觉地以女性主义理论升华自己的性别意识。静心就属于后者,她对女性主义理论有研究,也有自己的见解。但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考量,静心又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倾向明显的女性作家。静心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是温和的女性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女性主义。

静心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作不可能没有性别意识,但不能让性别意识遮住双眼,把性别问题无限放大可能一叶障目。换句话说,女性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性别问题,它和阶级、种族、文化、宗教等很多问题都交织在一起,而且其中的错综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区分。所以,在关注女性问题的时候绝不能目光狭隘,也绝不能单线思维。有性别意识,但不惟性别意识,才是女性写作者应该拥有的襟怀吧。”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她的温和的女性主义的特征。静心的温和的女性主义不强化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对立,不把男权主义作为女性困境的惟一理由,温和的女性主义更看重从女性的内部去处理问题。

从《大沙河畔》可以看出静心创作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静心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由实验室搬到了广阔的社会之中,她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表达由过去的侧重于从理论上进行提纯,转向了直接面对生活的芜杂。

玉儿虽然不是《大沙河畔》的主角却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小说基本上是以玉儿的视角来叙述的,也是作者主体性的表现。玉儿典型地体现了静心的温和的女性主义的追求,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玉儿虽然是理想的,但同样也具有强大的现实性。这也证明了静心的温和的女性主义同样是现实主义的,是在现实中可以操作的。但玉儿又是低调的,所以静心并不将其作为主角来写。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二哥一家和大哥一家展开的。然而玉儿在情节的充分展开中,逐渐成为了这个大家庭中的关键人物,家庭中遭遇到了婚姻、爱情以及亲情的矛盾冲突时,是玉儿来着手解决的,而玉儿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姿态就是:妥协。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玉儿新婚时,准备在婚礼上穿上她钟爱的白色婚纱。但她的婆婆守着农村传统的观念,认为白色不吉祥,要求新娘在婚礼上穿大红的衣服。最终玉儿妥协了,“本想再抗争的玉儿在家复的抚摸下放弃了抵抗,”不仅穿上大红的衣服,而且觉得“效果还真不错”。当然玉儿的妥协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面对现实复杂性的一种策略,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

# 温和的女性主义

□贺绍俊

# 平原的不平凡历史

□李鲁平

《贫困时代》以应运东的成长为线索,从应运东的童年、小学、初中,一直写到下学回乡参加劳动。这是一个平原的孩子的成长史。应运东从小表现出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性格与品质。他内敛、安静,聪明、好学,勤奋、倔强。与同样成长于贫穷时代的平原孩子不同,应运东既能承受苦难又充满理想和思考。在不能被推荐继续读书之后他也能平静接受现实,回到乡村,回到平原的湖泊沟渠上战天斗地。应运东的成长历史证明这个阅读面宽广的青年,从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听话”、“懂事”的青年,他没有超出他所处的思想氛围和历史环境,尽管他暗自下过决心找出害死父亲的凶手,也只是对“冤屈”的不满,并非对“世道”的质疑。当然,应运东并非没有反思自己的成长历史。在小说的最后,他把文家才的遗书《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了两遍,而文家才对当时的时代是有思考和批判的。“文化大革命,已然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一个新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文家才对整个国家经历的10年浩劫以及自身价值难以实现的困惑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应运东的困惑。小说写到他读完遗书的心理时说,应运东“似乎早就明白了,可又好像更不明白了”,这正是1976年底,处于时代重要转折点前夕许多青年的思想写照。《贫困时代》以应运东的成长映射了一代人的成长、困惑、思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的萌芽、分蘖、生长的艺术化呈现。

与应运东的成长相伴的是另一个世界,是丰湾大队的风云变化,是应氏家族的盘根错节,是父亲应格严从25岁到40岁短暂的人生。应格严胆小、懦弱,但同时又精明、勤劳。他害怕强势的干部和干部家属,他对委屈不敢反抗,对矛盾不敢面对。尽管如此,应格严对平原和湖泊的知晓超出一般的农民。无论多么贫困,无论什么年成,他都能从平原、湖泊、沟渠中发现改善生活、换取日常生活开支的手段和方式。这种对资源的挖掘和对智慧的利用,使得他依然显得成竹在胸。只要有水,有平原,他就自信可以承担并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应格严的人生证明作为父亲,他与儿子一样,也是内敛的、聪明的。他的才能表现在与大自然打交道上,儿子的才能表现在读书和文字表达上。父子二人都缺乏面对“人”、面对社会的勇气。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性格。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诚然有“刁民”,有敢于面对社会和命运的农民,但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农民都属于老老实本分的一类,他们面对社会、面对权力、面对制度,毫无勇气和力量。他们从来都是逆来顺受,把力气和智慧都挥洒在土地之上。应格严的悲剧和卑微也是亿万农民的悲剧和卑微。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应格严是一个合格和优秀的农民,他在极端贫困的时代里,力尽所能避免灾祸,起早摸黑、打渔摸虾,力尽所能维持与一个乡村的社会关系,支撑一家老小的世界。当然,在一个极不确定的社会里,任何的小心翼翼都不足以确保安全和安然。这正是个人命运的渺小和卑微。《贫困时代》写出了这一普通农民的人生疼痛。

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阶段,曾经有许多作家的作品触及过这段不忍书写的歷史,但大都是从下放知青的命运、从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入手,而且这些作品主要是立足于启蒙的立场来讲述时代和人物命运。《贫困时代》显然不是这样一种写作,它更接近一种亲历、自传、纪实。在《贫困时代》近60万字的篇幅中,以近乎纪实和传记的方式,来关注这段特殊历史中的农民的苦难,过去似不多见。从书写乡村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高写真”未尝不可以尝试。



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说过:“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100年以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人活百岁终有一死,要永生只有留下不朽的东西——永远会活动,那就是不朽了。”追求不朽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当下”即将过去,历史又常常被史家叙说得有条不紊,历史中的偶然,历史中的血与火场面,还有历史中个体的精神、情感鲜活与复杂,常常被史家所忽略,这些恰恰是文学表现的主体对

# 贫困与喧嚣的江汉平原

□吴 艳

象。小说再现的社会生活是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看文本所“固定”的社会生活,能否通过读者的阅读而“照样”又“活动”起来。《贫困时代》是能够照样活起来的江汉平原农村镜像。镜像中栩栩如生的普通人:村民及他们的孩子,以应格严、应运东父子为代表。

父亲应格严是一家之主,妻子身体不好,却生养了5个孩子,孩子要长大成人,不饿肚子是最低要求,孩子的成人还应该包含精神品质上的守住底线或达到更加高的道德水准。这位父亲就总是在操心:如何在集体出工后再打鱼、打鸭,甚至从赌博中赚钱以养家糊口;还要严苛地管教自己的孩子。疲惫、困顿的一串串日子,徐缓地煎熬着他,直至以青壮之年死于非命。

儿子应运东是长子,放牛挣得工分以后才心安理得地上了小学。这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荒年歌、民谣、游戏、猜谜、古话(讲故事)这些精神生活不能满足他对读书的渴求。他学会了攒钱买书,什么书都读,按自己的兴趣广泛阅读。他不在乎穿新衣,也经常饿肚子,他全都不在意,只要有书看。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应运东的成长过程,不仅物质匮乏,更糟糕的是缺少丰富的文化滋养。有的只是农村民间文化,随着现实运转的政治文化,后者的尖利与喧嚣,困扰着这个孩子,那些儿童少年不可或缺的、与民间文化相辅相成的传统精英文化、现代文化,不仅贫乏,几乎就看不见了。

求生的本能,向上的精神,自然的馈赠使水乡人们的生

活在贫困与喧嚣、快乐与惨烈中流淌。生与死、饥饿与贫

困、抗争与隐忍一直陪伴着他们。

度的叙事是客观而冷静的,小说的开头和有些章节,其笔法冷峻,尤其是对次要人物和情节的展示,让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呼兰河传》里萧红向我们描绘北方小城的民间文化与精神生活:跳大神、放河灯、看野台子戏还有娘娘庙会、跳秧歌等等。在《贫困时代》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类似的、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化生活,有的只是孩子们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荒年歌、民谣、游戏、猜谜和古话(讲故事),那些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化形式属于“四旧”被完全“破”掉了,这无疑是小说表现的那个时代独有的历史环境。

《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的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和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令人心碎。透过这些人物悲惨的生活际遇,我们看到了传统封建思想、封建习俗如何戕害人们,旧中国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极大罪恶。茅盾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也被后人评价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心态开掘、批判的力作。

《贫困时代》的长处一方面是复活了江汉平原的农村生活,是贫困而喧嚣的,一方面是它的人物塑造。小说没有简单地判断是非,臧否人物,而是在复杂人事里显见人物的生存智慧与人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开掘和批判国民心态方面则显得有些游移;在叙事的节制和小说架构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不必苛责,却也期待着作者在以后的创作中能有所突破。

# 开启被遮蔽的乡村历史图景

□蔡家园

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以少年应运东的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描写一个家庭的命运变迁,真实地记录了江汉平原上的人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图景。作家返回到时代的深处,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通过打捞五光十色的记忆碎片,力图还原五彩斑斓的历史画面,充满了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因而别具阅读吸引力。

小说集中描写的是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夜的故事。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立足个体价值进行政治、社会批判,着力渲染“伤痛”“迫害”记忆有所不同,度并没有预设立场,而是从原初的生活感受出发,细致入微地书写着特殊历史时期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的精神状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主人公应格严妻子患病、孩子众多,生活比一般人家更为困苦。对他而言,生活的中心就是求温饱。无论是打鱼贩卖,还是聚众赌博,他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他的形象就是当时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缩影,折射出农民的某些“根性”——既粗暴又懦弱,既老练又狡黠,既勤劳又投机,既有顽强求生的挣扎,也有逆来顺受的隐忍。他最后悲惨地死于干部的暴虐,这也折射了那个时代的阴影和疼痛。少年应运东从小

渴望读书,却没有机会升学,失去了任何上升的社会通道。面对父亲的暴力,他只有消极反抗,一味逃避;而面对干部的欺压,他由开始的隐忍到终于爆发,发誓要讨回公道,开始了积极反抗。从他的身上,隐隐可以看到作为个体“人”的觉醒。作家将满腔的同情倾注在笔下的人物身上,没有强加给他们太多的观念,而是任由其在生活中游走、观察,因此,透过这些人物可以窥见在过去的文学叙事中被遮蔽或忽略的许多生动历史图景。譬如,乡村的阶级斗争,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激烈;被日常生活缠绕的政治更多的是与人际关系、宗族矛盾甚至干部的个人素质相关联。这也启发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远不是通过简单的政治否定和批判就可以实现,还需要返回到历史现场,去耐心辨析驱动历史运动的各种复杂因素。著名理论家卢卡契在谈论巴尔扎克的创作时曾经说过,从艺术的内在规律出发,作家会描写他真正看到的,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物。他的意思是,现实主义创作必须坚持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度的这部小说显然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的真理性原则,以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真实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生活,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认知价值。

度的这部长篇小说固然别具阅读魅力,但在艺术上也存在不少遗憾之处。譬如:人物性格基本是扁平的,缺乏心理深度;故事情节疏于精心架构,生活虽多姿多彩,但有时未能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风俗民情的描写固然生动丰富,但尚未有机地嵌入叙事之中,给人油水分离之感。